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王
W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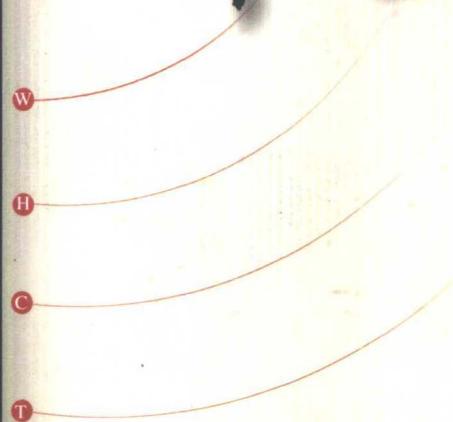
询
XUN

著
ZHU

经济组织

王

王
询
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文化传统 与 经济组织

文化传统与
经济组织

之江传统

经济组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王询著. -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5

ISBN 7-81044-501-4

I. 文… II. 王… III. 文化传统－影响－经济组织－研究 IV. F-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290 号

文化传统与
经济组织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网 址:<http://www.dufep.com.cn>

读者信箱:reader@dufep.com.cn

大连海事大学印刷厂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46 千字 印张: 12 1/2 插页: 2
印数: 1—3 000 册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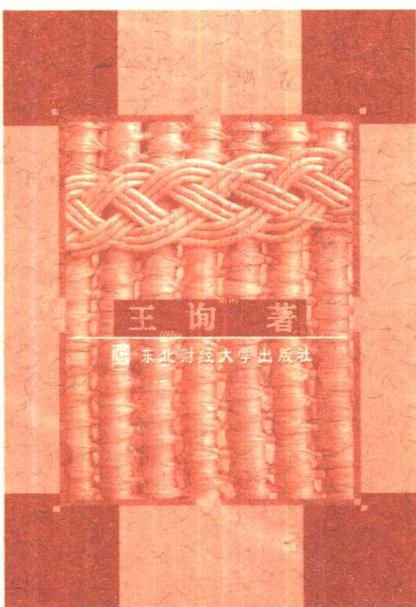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叶知秋
封面设计:冀贵收

责任校对:刘铁兰
版式设计:冀贵收

定价: 25.00 元

本 书 简 介

本书以跨学科的视野考察了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特别是人际关系以及两种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对市场交易及企业组织的组建过程、内部关系、组织规模结构的影响。从新的角度阐述了市场交易和企业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分析了人际关系对市场形成和企业组织发展的作用;比较了东西方以及一些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人际关系模式;深入探讨了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在东西方市场形成和企业组织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间形成的组织形式上的一些重要差异,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作出了评价;最后分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企业、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差异。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内容和动因的多元性	(1)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性	(8)
第二章	文化与文化传统	15
第一节	学术界对文化的重视程度	(15)
第二节	文化传统作用的二重性	(21)
第三节	文化的概念	(26)
第四节	个体层次与人际层次上的文化传统	(34)
第三章	人际关系与社会组织构成	41
第一节	交往与人际关系	(41)
第二节	人际关系结构与模式	(48)
第三节	社会的组织构成	(57)
第四章	人际关系与经济交易	66
第一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际关系的忽视	(66)
第二节	人际关系与交易成本	(72)
第三节	人际关系对经济交易的其他影响	(85)
第五章	人际关系与企业组织	92
第一节	企业组织发展的意义与性质	(92)
第二节	企业的组建成本与组织能力	(99)
第三节	组建企业的自组织方式	(103)
第四节	人际关系与企业的组建	(109)
第六章	人际关系与企业内部关系	119
第一节	人际关系与组织成员构成	(119)

文化传统
与
经济组织

第二节 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	(127)
第三节 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	(135)
第四节 人际关系与组织的规模	(145)
第七章 市场交易的历史发展	152
第一节 传统经济中的市场交易	(152)
第二节 传统人际关系对市场交易的限制	(161)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形成:边缘上的发展	(168)
第八章 企业组织的历史发展	182
第一节 传统社会中的基本经济组织	(182)
第二节 工业化早期的家庭企业	(190)
第三节 向工厂制度的过渡	(197)
第四节 传统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	(202)
第九章 儒教与基督教的人际关系模式	215
第一节 对儒家文化历史作用的评价	(215)
第二节 典籍文化的比较	(226)
第三节 从宗教典籍到宗教生活	(232)
第四节 世俗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236)
第十章 东西方传统经济组织比较	243
第一节 家庭与农户	(243)
第二节 农户间合作的需要	(253)
第三节 农户间合作的社会形式	(262)
第四节 社会中间组织	(268)
第十一章 东亚文化传统与市场交易形式	279
第一节 东亚文化传统与市场形成	(279)
第二节 现代东亚市场交易形式上的特点	(290)
第三节 对东亚市场交易形式的评价	(301)
第十二章 东亚企业组织的发展与组织形式	308
第一节 文化传统与早发内生型企业	

组织发展	(308)
第二节 东亚现代化中的企业组织发展	(317)
第三节 东亚企业组织的一些例证	(323)
第四节 东亚企业组织的特点与评价	(335)
第十三章 企业、市场与政府	346
第一节 企业与市场的理论	(346)
第二节 东西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比较	(354)
第三节 企业、市场与政府	(366)
参考文献	(375)
后记	(389)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内容和动因的多元性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发展内容的多元性。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地是所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某种形式的、或多或少的、或迟或早的变化。而且，其中各个方面变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方面的变化会对另一方面变化发生某种带动作用，而一个方面的停滞必然对其他方面的变化起到牵制的作用。对此，很多学者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指出：“关于经济增长是一种变化的形式的观念提醒我们，变化从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它也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① 这也就是说，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某种跨学科性。正如汪熙在谈到中国现代化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纵深度和横向面是如此的深沉与广阔，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因

文化传统

与

经济组织

^① [美] 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此，它注定是一个跨学科的任务。”^①

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我们没有能力完整地描述和解释全部发展过程。应该承认，对于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事物，至少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如摸象的盲人，在独立研究的过程中，只能对这个事物得出片面的认识。学者们只能进行某种分工，每一个研究者，只能将其视野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各自从不同角度研究这同一过程中的不同方面。例如，经济学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且，还应该承认，个人的认识受其认识能力的限制，对自己所关注的方面所得出的认识也常常是片面的。但是，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不像摸象的盲人一样地固执己见，简单地否定别人的认识，则至少可以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能够逐渐接近全面的认识。由于本书作者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背景，自然地使本书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领域。进一步说，本书研究的内容是更为有限的，它不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而是将研究的范围限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组织形式问题上。只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忘记各个领域的相互关联。因此，本书不能不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在本书中，我将尽力保持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

^① 汪熙、[美] 魏斐德：《中国现代化问题》，主编前言，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①

与发展的内容同时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发展的动因。自欧洲社会率先由传统形态进入现代形态以来，人们便在苦苦地探索：这种发展或“现代化”的动因何在？以致发展的动因一直是有关发展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常常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什么因素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于传统社会形态？

佩雷菲特指出：“不发达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倒是要把发达看成是一个奇迹，而且是最近才产生的一个奇迹。”^②“奇迹”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对其产生的原因不甚明了，人们对发展动因的看法莫衷一是有其必然性。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曾经列举了前人对发展原因的一些解释：1. 科学和发明；2. 自然资源；3. 心理原因；4. 运气；5. 不端行为；6. 收入和财富的不均；7. 剥削；8.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9. 奴隶制度。^③也有学者将有关发展动因的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种：1. 经济推动论；2. 科技推动论；3. 文化推动论；4. 制度特别是所有权制度推动论；5. 阶级斗争推动论；6. 国家间战争刺激论等。然而，这远非以往的人们所提出的全部解释。事实上，如果要列举全部解释的清单是非常困

^①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11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② [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纪的撞击》，6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③ [美]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7~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难的，而且将使我们的复述篇幅过大，且沉闷乏味。

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的许多研究中，对发展动因的看法常常有失片面，常常在强调某一动因时，忽视了其他因素。事实上，任何一个复杂的系统都是由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的，而任何系统的一种深刻变化都牵涉到系统内的方方面面。社会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即现代化则是社会系统规模宏大且极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因素的变化本身都是整体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与其他因素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一般说来，社会科学家在研究现代化过程时，作为动因所提取的某一因素的变革，通常也是整个发展过程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它同时也是其他因素变革的动因。如新制度学派曾正确地提出：科技进步、资本积累等等是发展过程本身，它们本身存在受什么动因推动的问题。然而，这一学派否认它们作为现代化动因的意义却是错误的。新制度学派把发展的动因归之于制度变革，特别是所有权的变革。对此，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提出，制度变革或所有权变革本身也存在动力来源问题。同理，其他诸如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同样存在动力来源问题。

换句话说，研究发展动因的学者们常常将他们作为动因所提出的因素看作是外生变量，而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内生变量。笔者并不否认外生变量的存在，但就社会发展的历

史过程来说，真正的、纯粹意义上的外生变量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如果硬要寻找外生变量作为其动因，则最终发现的更可能是一些通常被视为偶然的、不大引人注意的因素，或者陷入探索“宇宙第一动因”那样的哲学困境。也许，更为合理的方法论是承认内生变量作为动因的意义，将社会发展过程视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的因果关系网。按照这种方法论，则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发展动因的理论一般都是探索了这一因果关系网中的一个环节，尽管这一环节可能极为重要。这一观点并未否认各种理论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个学者都难以穷尽这一因果关系网中的所有因果关系，而只能截取其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环节，甚至一个环节所包含的双向作用关系中一个方向的作用及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只是，我们应该避免武断地否认其他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陷入单一因素决定论的陷阱。

可以说，在现代的有关研究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放弃了历史发展的单一因素论，而采取了多因素论，即认为发展是多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一位学者写道：“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连接，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①“琼斯（E.L.Jones）在试图说明欧洲奇迹产生原因时，得出这样一种观点：这好像一把巨大的密码锁，对于它，不是只有一把钥匙，也不是只有一种组合，它有相配合的很

^① [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好的零部件足以使它起作用。”^① 再如，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非常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育的作用，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甚至曾明确提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②

在对发展观的讨论中，常常不能不提及决定论与选择论这两种历史观的争论。作为一种历史观，历史决定论可谓源远流长，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③ 但其基本含义是相同的：即认为有一种或若干种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或这些因素的状况决定了社会的状态及其发展变化。而且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某种“独立的变量”。极端的历史决定论排除了人们在历史发展中作出选择的余地，否定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的历史观是历史选择论，它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人类自身选择的结果，是人类自身无尽追求的不断凝聚。有些选择论者承认，人们以往的选择会成为以后进行选择的基础，从而限定以后选择的范围。极端的选择论者则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甚至否认以前的选择会限制以后的选择范围，而只考虑人们当时的选择。一般地，我们可以说，决定论是一种“客观”的理论，选择论则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显然，极

① [英] S.B. 里丁：《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7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② 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③ 例如，从对决定因素的认定方面看，可以区分出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自然环境决定论、神的意志决定论等；从决定的程度上看，可区分出极端的和各种不太极端的决定论。

端的历史决定论与极端的历史选择论都不能解释现实的历史发展。但与此同时，决定论与选择论又都具有其“合理的内核”。历史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这些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各种影响因素的意义在于它们决定了各种选择被人们选择的可能性，并排除了某些选择的可能性，限定了选择的范围，但是，这种限定并非将历史限定于一种可能性，没有任何一种因素或几种因素能将一个民族或国家固着于一条预先设定的航道上。或者说，这些因素的意义只是概然性的，而非必然的，它们只是某种可能性，尽管有时使某种选择被选择的可能性很大，但仍不能成为必然的。只有已经存在的才是必然的，未来则总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从各种因素的横向关系看，在发展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因素都不能严格限定其他方面所具有特征。例如，在大体相同的经济基础上，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态；相反，在大体相同的文化基础上，也同样可能出现不同的经济形态。这种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解可以称之为“有限选择论”，即人们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但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作出选择。

根据以上有关方法论和历史观的讨论，本书将研究的范围限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组织形式问题上。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推论说，不仅整个发展过程是多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发展过程中的某个具体方面，如本书集中研究的组织形式方面的特征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限定的。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本书作者愿意承认自己不具有

全面探讨所有这些因素的能力。本书只是集中研究其中一个方面的因素，即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将在社会发展过程这一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中截取文化与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一环节。并且，在这两者的双向作用关系中，主要考虑文化对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组织形式选择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并不排斥其他的解释。而且，这种选择并不带有文化决定论的色彩，甚至也不意味着在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中前者是唯一地起决定作用的一方。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没有适当的文化基础，经济现代化是难以启动的，即令经济发生了指向现代化的变动也是难以巩固、难以为继的；并且，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组织形式的选择是受文化基础影响的。这里存在着简单明了的作用机理：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人的行动是受其思想、价值观即文化支配和制约的。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性

早期历史发展观的建立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一度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发展观。显然，这种发展观是一种单线进化观。即人类社会乃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将踏着先行者的足迹，沿着同样的道路，以同样的形式，经过同样的发展阶段，最后达到同样的目标。直至 20 世纪 50—60 年代，这种发展观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时发表的发展研究或现代化研